



□ 剑 钧



初读《可爱的中国》，我便为其文字所震撼了：“假如我还能生存，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；假如我不能生存——死了，我流血的地方，或者我瘠骨的地方，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，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 my 精诚的寄托吧！”我读此便想，那流淌着鲜血的红土地，长出来的一定是红花吧。那一年，我11岁，刚上小学五年级。父亲买回一本《可爱的中国》，对我说，你该好好读读这本书。我还清晰记得书的封面，火红火红的颜色，至今仍像一团火在我眼前燃烧。书的右上方是方志敏的头像，目光深邃，神情刚毅，一头浓发向后梳理着，给人一种坚毅的力量。

（一）

我至今对书中的文字记忆犹新，曾在 一篇散文中慨叹：“一个行将迈向死神的囚徒，没有悲痛欲绝、没有怨天尤人，却面带微笑，用诗的语言讴歌祖国，这是让我最为感动的泪点。”多少年后，我方理解了方志敏那句肺腑之语的深深内涵。一位如此淡定看待死亡的人，将慷慨赴死当作一次浴火重生，凭的是对祖国的大爱，凭的是信仰的力量。

我想起屈原那句：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”在汨罗江边，楚大夫沉吟水畔，呜咽流水，一夜踟蹰，怀石一跃，九死不悔。一部《离骚》，慷慨悲歌，心忧家国，读起来都是泪。两位历史人物相隔了2200多年，一个悲怆投江，一个从容就义，都缘自共有的家国情怀。恰如鲁迅所言：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

时至今日，我脑海里还会浮现一间囚室的影像：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，一把锯短了脚的矮竹椅，一张单薄的铁床，一只未漆未盖的白木箱……这就是方志敏文中对囚室家具的描绘。囚室里黯黄色的裱纸，蓝磁的痰盂，折叠了三层 的棉被，还有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，这些物品杂乱无章的组合看起来很不协调，且很寒酸，但这并不影响方志敏在这间伴着铁镣声的囚室里，写出振聋发聩的传世名篇《可爱的中国》。

（二）

方志敏在阴暗而狭小的囚牢奋笔疾书，用手中的笔，于方寸之间，丈量祖

国的大好山河：雄巍的峨嵋，妩媚的西湖，幽雅的雁荡，秀丽的桂林山水……足以傲视一世。他深情地写道：“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，到处皆景，自城市以至乡村，一山一水，一丘一壑，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，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……”

我一遍又一遍读过《可爱的中国》，倾倒在那优美典雅的文字里，一次又一次叹为观止：“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。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？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，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。以言气候，中国处于温带，不十分热，也不十分冷，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，不高不低，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。以言国土，中国土地广大，纵横万数千里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、胸宽背阔的妇人……”这是一位革命者，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、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，面对血雨腥风，戎马倥偬，又身陷囹圄之后，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告白，字字含情，句句含爱。

方志敏将祖国的崇山大岭、长江巨河、大小湖泊，喻作“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”，他对其为之奋斗的祖国未来充满了希望。他将其象征为祖国母亲“保有着无穷的乳汁，无穷的力量，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。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”。这是一位共产党人的情怀，也是一个浪漫诗人的想象。文中没有一丝忧伤，半点怆然，跃然纸上的是一副铮铮铁骨和赤子之心。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胸襟，共和国的旗帜，血染着千百万英烈 的风采。爱我中华，从来是不需要理由的。

（三）

1935年1月，在浙赣交界的怀玉山麓，红十军团陷入国民党军重围。方志敏命令粟裕等率先头部队冲出重围，自己带着身边十几名警卫人员留下等待大部队。红军虽杀敌无数，但多次突围未果，血战八天八夜。方志敏七天未食、饥寒交迫，藏身在一片小树林里，被搜山的两个国民党兵发现了。他们见捉到一个红军“大官”，不禁大喜过望，满以为这回发大财了。他们认定方志敏身上至少也藏着千八百块大洋，或藏有金手镯、金戒指一类的细软来。万万没想到，他们从上身摸到下身，从袄领摸到裤底，只发现一只作战用的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，连个铜板都没能找到。这是方志敏在囚牢里所写《清贫》中描述的情节，文字里袒露了革命者坦然之中对鼠目之輩的轻蔑。

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，一个共产党人的襟怀，岂是以升官发财为“己任”

的国民党军人所能理解得了的？在囚室里，每日埋头写作的方志敏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从容笑对那些走马灯似的来“劝降”的国民党高官，横眉冷对那些污蔑他只顾工农利益，却不爱国家、不爱民族的谬论。方志敏奋笔疾书，在人生最后时刻写下了《可爱的中国》。他深晓自己是一个“待决之囚”，遗憾“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”，但他依然要用最后的时光，为可爱的中国留下一片赤子之情。我一次又一次被这情感跳动的文字所打动，有种高山仰止之感。

《可爱的中国》是方志敏对国人的最后的呐喊，面对“到处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，在黄包车夫和苦力的身上飞舞；到处可以看到饮得烂醉的水兵，沿街寻人殴打；到处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丧棒，不时在那些不幸的人们身上乱揍”，他要唤醒尚在沉睡中的民众。

《可爱的中国》是方志敏对民众最后的呼唤，“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，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！无论如何，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，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！”这是囚牢锁不住的最后吼声。

《可爱的中国》是方志敏对祖国最后的告白，他坚信有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、为民族谋解放的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斗，“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……到那时，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，欢歌将代替了悲叹，笑脸将代替了哭脸，富裕将代替了贫穷，康健将代替了疾病，智慧将代替了愚昧，友爱将代替了仇恨，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，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！”这是一个含笑走向刑场的囚徒，用鲜血浇灌的赤诚之花，是对祖国母亲大写的爱。

（四）

儿时，我读《可爱的中国》，远没今天理解得这般深刻，我为方志敏的家国情怀和献身勇气所感染、所感动，但我并未能真正走入他浩瀚的内心世界。今天，我懂了：为什么那么多革命先

烈，像方志敏一样慷慨赴死，含笑九泉。在他们心中都憧憬一个“可赞美的光明前途”的中国，他们在用生命书写对祖国的大爱。

前段时间，我去故宫博物院观赏“何以中国”展览，在展厅里，我流连于全国30家博物馆精选出来的130余件文物中，仰望日月星辰，天地之间；感受泱泱中华，海纳百川。我蓦然想到方志敏在《可爱的中国》里，对祖国万里沃野、壮美山川的赞美。可爱的中国，上起石器时代，下至清代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。何以中国？是青铜重器何尊，尊内铭文出现的“中国”二字，迄今有3000多年。三星堆的青铜太阳轮、湖北云梦的睡虎地秦简、良渚文化的玉琮……都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亮眼浪花。恰如方志敏所言：“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，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，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。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，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，得到了自由与解放，这种创造力，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。”

而今，方志敏的遗愿一步步地实现了。当我从直播中目睹神舟十三号飞船发回的视频，女航天员王亚平身着中国新一代“飞天”舱外航天服成功出舱的那一刻；当我从北京冬奥会的闭幕式中分享中国奥运军团满满的收获，以及“折柳寄情”的浪漫惊艳世界的那一刻，我愈发有了做一名中国人的自豪。迈向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已“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”，祖国母亲也“最美丽地装饰起来，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”。

重读《可爱的中国》，我的心融入窗外的春色里。想到这些年，我走过十几个国家，但转了一圈，还是觉得自己的国家好，尽管她还是发展中国家，但这并不妨碍我热爱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，就像方志敏烈士所言“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”。

想起那年春上，我来到云南丽江，看到玉龙雪山一条清澈的小河，顺茶马古道潺潺流淌，一直流到村寨里，我在纳西族大叙家的外廊里惬意地喝碗茶、听鸟语、闻花香。想起那年夏日，我来到科尔沁草原，煮微的曙色给辽远的碧野镀金镀银，乳白的蒙古包旁，狂奔的骏马踏破绿毯般的牧场远逝，悠扬的马头琴将顶碗舞姑娘的情韵掠上琴弦。想起那年秋天，我来到乌苏里江畔，一江碧水，托起久唱不衰的《乌苏里船歌》，一方黑土，承载着金黄的稻浪。我与同行友人在中国界碑前留影，让丰盈的岁月，在静水中诗意般流淌……

这就是我可爱的中国。这就是我美丽的中国。这就是我生命里的中国。

1876年，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市杓子冲。作为一名晚清秀才，他拥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，在诗词创作方面有较多积累。从早期自发探索革命道路，到入党之后积极开展工农运动、培养革命干部，并最终献身苏区，何叔衡革命生涯的每个重要阶段，都始终坚守着对革命“大家”的一片赤诚和个人“小家”的以身作则，并闪耀在其诗词之中。

通俗放贤声。与何叔衡在湖南自修大学共事过的熊瑾玎曾写过一首诗，“新民倡学会，通俗放贤声。阶级成仇憾，船山作斗争”，反映的正是何叔衡早年传播先进思想、鼓励青年追求进步、为革命“大家”积极培养人才的事迹。

1918年4月，为将爱国人士组织起来，更有力地传播新思想，毛泽东、何叔衡等人组建了进步团体——新民学会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，为更好培养党的青年革命干部，何叔衡等人还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。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夏明翰渴望参加革命，但经常遭到祖父夏时济的阻拦。何叔衡知道后，不仅帮他逃出家门，还推荐他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，并鼓励他抛下顾虑，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。为此，何叔衡还赠诗一首“神州遍地起风雷，投身革命有作为。家法纵然难锁志，天高海阔任鸟飞”。

受此勉励并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，夏明翰提出了入党请求。何叔衡问他为什么入党，夏明翰表示，“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牺牲一个旧我，迎来一个新我，使自己能够为工农的翻身和人类的解放奋斗终身”。说罢，何叔衡进一步引导他，“一个人如果怀着对个人有什么好处的动机入党，这是对共产党的一种玷污，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奇耻大辱”。深受鼓舞和启发的夏明翰从此走上了为党工作的道路，并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干部。

除此之外，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还吸收了杨开慧、姜梦周、毛泽覃、陈赓等学员，为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。这些新生革命力量的涌现不禁令何叔衡感慨，“汇集间群书博览者，何其好也；集天下英才教育之，不亦乐乎”。

平日能谋更善断。在促进革命“大家”发展的过程中，何叔衡还擅于争取个人“小家”在内的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，正如萧三曾评价的，“作事不辞辛劳，感情一推则火腾。平日能谋更善断，赤胆忠心无与伦”。

1921年8月，从上海参加完中共一大的何叔衡回到湖南开展地方建党和工运活动。孙中山正在考虑举行北伐，如果能促成北伐取道湖南，并借助孙中山等人的力量打倒湖南军阀，不失为推进湖南革命发展的一个好办法。因此，何叔衡主动联系何梓林，希望通过他联系上孙中山。

何梓林是何叔衡的堂兄，是何叔衡个人“小家”的一分子。受何叔衡影响，何梓林从少年起就一心报国，并考入军校、进入军队、加入同盟会。在了解到何叔衡的想法及湖南的现状后，他立即促成了何叔衡与孙中山的会面。会面时，何叔衡不仅表达了对北伐的支持，还愿意在湖南开展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工作，为北伐军的到来打好群众基础。何叔衡的谋略和智慧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。

同时，为实现北伐胜利，何叔衡还鼓励何梓林为民众而战，并赋诗“胸罗紫电，气吐长虹。骑马试剑，自西徂东。其蹄何疾，得意春风。犁庭扫穴，痛饮黄龙”。受到激励的何梓林带着一腔报国热情开始了战斗，但不幸于1922年在福州外围水口与北洋军阀部队激战时，中弹牺牲。作为家属，何叔衡接受了孙中山和廖仲恺为堂兄亲笔书写的挽辞“为国捐躯”“气壮山河”，并表示将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，一如之后廖仲恺被刺身亡时他坚持的，“所悲未竟平生志；奋斗唯期后死人”。

此生合是忘家客。在苏区工作的3年多，是何叔衡生命的最后阶段。其间，他全身心投入苏区的工农检察、内务、审判等工作，为革命“大家”奋斗到最后 一刻，用行动为个人“小家”树

何叔衡诗词中的『大家』和『小家』

□ 徐佳佳

立榜样。

1931年8月之后，由于上海的斗争形势日益紧张，党决定让何叔衡转移到苏区。临行前，何叔衡找到女儿何实山、何实嗣等人，对他们作最后的叮嘱。何叔衡念起1928年6月他去苏联留学时路过哈尔滨写下的一首诗，“身上征衣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消魂。此生合是忘家客，风雨登轮出国门”。这首诗改编自陆游的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，表达了诗人从陕西南郑前线被调至四川成都时对国家命运的忧愁。而当时的何叔衡也即将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但想到国内的家人和时局，他又充满了不舍和担忧，因而不禁与陆游产生共鸣。但比起陆游“此身合是诗人未”的无奈与忧伤，何叔衡对自己“忘家客”身份的选择充满了革命者的坚定和果敢。

而这一选择是何叔衡早已立下的。何叔衡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，父亲和妻子都希望他能够回乡教书，安穩一生。但何叔衡却认为不应只顾个人“小家”的安乐，而应该用行动去改造社会，为革命“大家”奋斗。因此，他在给义子何新九的回信中申明了自己愿意为民族复兴舍弃个人“小家”的想法，“我绝对不是我家一乡的人，我的人生观，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的；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”。自此之后，何叔衡走出家门，长期为革命奔走，与家人大多时候只通过书信来往。

因此，在难得见面又即将长期分别之际，何叔衡再次向亲人们表明“革命者就是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”，不仅希望得到亲人们的理解，还期盼他们能像自己一样做一个不怕死的党员。临别时分，何叔衡还勉励两个女儿，“你们将来也会有机会到苏区的，那时我们又会在一起的”。但这一别，却是永诀。

1935年2月，何叔衡在转移过程遭遇敌人重重包围。危急时刻，年事已高的何叔衡不愿连累大家，就对同行的邓子恢说：“子恢，我不能走了，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”，说完便纵身跳下悬崖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这位“忘家客”依然在为战友和革命考虑，全不将个人的安危和得失放在心上。他的才华、为人及对革命的一腔赤诚令人敬仰，他的正身、律己及对家人的言传身教令人肃然起敬，正如谢觉哉所称赞的，“叔衡才调质且华”“临危一剑不返顾”。

老一代革命家诗词赏析

